

论中国体育发展方式的公共转向:从国家体育到公共体育

董传升

(沈阳体育学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辽宁 沈阳 110102)

摘要:使用逻辑归纳法和文献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出发,对中国体育发展方式由国家体育转向公共体育这一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回顾国家与公共关系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公共体育转向的基本内涵,构建了公共体育发展方式下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关系模型,论证了公共体育的价值基础;在分析国际公共社会发展趋势和中国组织理性成熟、公民理性不足的前提下,构建了基于较为成熟的组织理性暂时替代尚未成熟的公民理性的中国公共体育发展方式模型,明确提出了公共体育的价值基础、发展目标、实现路径和保障措施等基本要求,旨在为中国实现体育发展方式的顺利转向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体育发展方式;国家体育;公共体育价值;发展结构;组织理性;公民理性;公共理性;体育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G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3)01-0014-07

On China Sports Development Pattern: Turning from State Sports to Public Sports

DONG Chuan-sheng

(Sport Social Science Center of Shenyang Sport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02,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From perspectives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and new public service theo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that China sports development changes its pattern from state sports to public sport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ogic induction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state and public relation theories, it expounds essential conceptions about the turning of China public sports, builds the relational model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ss sports and competitive sports in the pattern of public sports, demonstrates the value foundation of public sports. With the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maturity of reason of China's organizations and the lack of reason of citizens, this study builds the model of China public sports development pattern based on the mature reason of organizations instead of the immature civic reasons, and explicitly puts forward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the values, development objectives, implementation paths, and safeguards of public sports, which aims at providing the theories supporting the successful turning of China spor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sports development pattern; state sports; public sports value; development structure; reason of organizations; reason of citizens; public reasons; sports public service

目前,公众对体育公共服务需求越来越强烈,体育权利意识也在逐步苏醒,我国体育已经到了真正要认真思考何去何从的时候了:要么在现有的框架下,沿着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思路^[1],寻求体育如何面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解决之道;要么以更高的视野,更具长远性的战略眼光,重新规划和确立新的体育发展方式,引导我国体育的彻底转型。

我国体育应该从解决根本问题入手,逐步脱离以

国家政治目标为主的发展方式,转而走向以公民体育权利保障为基本前提的公共体育发展方式。

1 我国体育发展公共转向的基本含义

1.1 国家与公共的关系 国家和公共都是政治学概念。一般说来,众多学者对国家概念持有不同的见解。在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在《论国家》一书中,认为

投稿日期:2011-09-26

基金项目:201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3180)。

作者简介:董传升,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体育科技与社会、公共体育、体育组织行为。

国家是人民的事务,是人们在正义的原则和求得共同福利的合作下所结成的集体;而韦伯在其所著《经济与社会》(上)中,将国家描述为,一种制度性的权力运作机构,它在实施其规则时垄断着合法的人身强制。由此可见,国家作为一个统治机构,对社会各种事物进行管理。

公共是与私人相对应的概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从自由经济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了公私关系。他认为,尽管私人利益总是至上的,但是当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和引导他去实现另一种目标——人们追逐自身利益的行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却经常会导致公共福利的增长,私人利益完全可以聚合成为公共利益。因此,解决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冲突的诀窍是建立起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政府从“牧羊人”的角色转变到“守夜人”上来^[2]。

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明确划分私人 and 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理念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20世纪初期,以美国杜威、英国霍布斯和凯恩斯为代表的理论流派对放任主义发起了挑战。凯恩斯认为,国家能够从科学角度处理市场失灵问题并协调公私之间的矛盾,因此应该对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进行更多的干预,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应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来源于私有空间的让渡与重新集合。作为与私人相对应的领域,公共空间是基于私人对相互之间关系目标实现这一出发点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是公共建立在私有的基础之上^[3]。

可见,国家机器作为协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一种有效工具,是处于公共和私人领域之上的政治学概念,其作用体现在科学安排和处理各种公共事物及其社会问题上。

1.2 国家体育转向公共体育的含义 我国体育的公共转向意指以国家政治主导的体育发展方式转向公民权利主导的体育发展方式。

何谓国家体育?国家体育是从体育服务对象的角度来说的,即以实现国家政治目标为前提,采用举国体制,以发展竞技体育为主的国家主导的体育发展方式,我们称之为国家体育。

在这种方式下,体育必须以国家利益的实现为核心目的。国家通过体育这一特殊途径,获得在国际社会中特殊的声望,“努力拼搏,为国争光”的口号就是国家体育发展方式的一个典型的缩影。为了确保体育的国家功能,我国采用了“举国体制”来支持体育实现国家目标。“举国体制”是以国家行政管理为主导,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业,以计划经济模式配置体育

资源的一种集体育行政部门管理体制、专业运动队的训练体制和全运会为中心的竞赛体制为一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4]。这就意味着国家体育以为国家利益实现为核心目标,服务社会公众必须以此为前提。

当前,我国体育从外向型的国家体育方式转向内向型的、以公共价值为核心的公共体育发展方式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有学者研究认为,体育的功能经历了一个由建国初期提出的为“国家建设和国防服务”到“文革”时期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发展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为国争光,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历史过程^[5]。可以说,从国家政治目标实现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过程,历史性地提出了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向命题。

所谓公共体育,我们可以理解为:以实现公民基本体育权利为前提,动员政府、社会和市场力量,以公民广泛参与为主要特征的公民主导的体育发展方式。

公共体育是一种体育发展方式,是与国家相对应的下位概念,其体现出体育服务宗旨和目标的客观转向公共的这一现实,即转向为以服务公众为主、以实现公共价值为核心目标的体育发展方式。在这一方式下,体育的国家服务职能必须以公共价值实现为前提。也就是说,我国体育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确保公众享有体育的权利,促进公共健康水平不断提升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保证国家政治目标的实现。

公共体育发展方式确立意味着:

(1) 国退民进。国家调整战略目标,国家战略目标开始转向公民目标,公共利益成为我国政府战略定位和执行的核心价值观,即从国家战略到公民战略。国家通过公民战略的确立和执行,逐步将其占有的公共空间让渡给公民,已形成公共空间,并以这样的路径来大力培育市民社会,培养公民理性,逐步使公民的理性参与成为我国体育发展战略制定和执行的决策依据。

(2) 公共价值主导。公共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成为体育发展的价值核心。我国体育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从为国争光逐步转向通过运动努力提高公民健康水平,满足公民体育意愿和实际需求上来,即公共健康的运动促进成为我国体育发展的主导价值。这就意味着,公民的理性参与成为体育发展的主导力量,即从决策参与到执行参与再到公民的全部身心参与,以形成运动健康市民社会发展模式,即从国家主导到公民主导。

(3) 公民体育行为方式确立。确立公共体育发展方式,客观要求国家政治主导的体育行为必须改变,

逐步“让渡”给公民体育行为。也就是说,国家要培育公民参与意识,提高公民参与决策过程的自觉性和理性水平,使公民共识逐步成为体育发展的主导意志,即从国家体育行为到公民体育行为。

2 公共体育的价值基础

2.1 公共体育的内涵

1) 公共体育是以公共健康促进为其核心职能的,因此服务公众,提升公共健康水平客观地成为公共体育的社会责任。既然公共体育以服务公众为主,那么公众的核心利益必然成为公共体育诉求的目标。一般说来,公众在基本解决了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交往、自我价值实现等问题之后,必然将关注的焦点从外在的物化目标转移到内在的自身健康发展上,由此形成了以公共健康运动促进为目标的公共利益诉求;而公众健康运动促进的集合,必然构成公共运动健康领域。因此,促进公共健康的提升,解决社会健康问题,客观地成为公共体育的核心职能。

2) 公共体育是以公民体育权利实现为其基本内容的。公民具有体育权利,这一条文已经写入我国《体育法》里。公民的体育权利往往表现为体育活动的参与权、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享用权、体育发展基本问题的决策权等。因此,这就客观要求政府必须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基础保障,形成内容丰富的公共体育空间,从而使公民能够参与体育活动,享有各种权利,促进公民体育权利的实有化^[6]。

实现公民体育权利,客观上必须要有与之相对应的体育发展方式,必须要从根本上建立一个结构合理、功能齐全、服务公众、高效顺畅等公共体育发展方式,这正是从立法的角度来体现的。有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公共体育发展方式才有可能真正确立。

3) 公共体育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体育公共服务路径建设来完成的。公共体育基本职能的实现过程,其实质就是体育向公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的过程;公共体育通过构建公共服务路径来确保其目标的实现。这就意味着,公共体育必须寻求高效的、操作性强的服务路径,并不断地强化路径建设,否则公共目标的实现就只能是一纸空文。

当然,这种公共服务路径建设与当前服务路径建设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其主要表现在:公共体育发展方式下,公共服务路径是体育目标实现的基本保障,是体育基本职能;当前方式下,体育要严格服务于国家目标的实现,公共服务只能在这一框架下建构其服务社会的途径。因此,前者方式下,国家目标要以公众的公共目标为前提,公共体育要兼顾国家利益的实现;后者方式下,公共目标要以国家目标为前提,国

家利益的实现要兼顾公众利益的实现。这必然会导致体育的重大转向,让体育的公共价值得以有力保障和完全实现。

4) 合理定位公共体育、群众体育(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关系。

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原本是体育某种形态的描述:群众体育是从参与人群特征的角度展开的,描述的是从事体育活动的某个人群。而竞技体育则是从体育本身存在形态展开的,是对人们采用何种形态体育活动的描述。因此,这两个概念都没有表达体育发展方式的基本内涵:即竞技体育可以为国家体育服务,也可以为公共体育服务;群众体育作为一种松散的社会形态描述的词汇,没有清晰地展现出体育方式的本质,更没有反映出公民体育权利这一基本内涵。

因此,我们可以构建这样的价值框架:作为一种体育发展方式的公共体育,处于价值层级的顶端,发挥着领导的作用,表现为体育发展的核心价值;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则是公共体育实现的基本手段,处于价值层级的下方,表现为工具理性价值(图 1)。



图 1 公共体育、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价值关系图

在处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关系时,需要改进目前国家体育发展方式下形成的价值结构,重新定位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发展关系:(1) 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都是实现体育公共价值目标的必要手段,因此公共价值是其存在和发展的核心;(2)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不是并列的关系,而应转变为竞技体育是促进群众体育发展的必要的、有效的手段,即通过竞技体育表演,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引导他们逐步接受体育,进而将之转化为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在这个关系上,群众体育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目的因,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价值前提;(3) 群众体育的发展需要一个能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手段,竞技体育通过其特有的表演方式客观承担着这一历史任务。为了确保这一手段持续发挥作用,群众体育需要不断地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发挥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使竞技体育成为群众体育发展的必要路径和手段,是群众体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社会基础。因此,建立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全面发展模式,是建立新型体育发展方式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建立我国公共体育发展方式,首要工作是要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体育公共价值体系,然后才能逐步依据这一体系的构架,完成公共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

通过“分享运动”实现我国体育的可持续发展^[7]。

2.2 公共体育的价值基础 既然公共体育是以实现公众核心利益为目标而存在的,那么公共体育必然建立起一个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价值体系,而不能使公共体育保持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势^[8]。

2.2.1 公民与民主价值 公民与民主价值是公共体育的价值基础。公共体育发展方式,需要高素质的具有正义感的公民作为其基础。一般说来,公共体育需要的公民应具有诚实、坚持原则、互惠互利的精神。这些精神聚合起来,逐渐发展成为个人的信念。而这恰恰是公共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东西。公民有了信念,可以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理性公共空间;而公民对这一空间的维护和扩展,正是公共体育发展的必要前提。

公众的公共需求,应该如同哈贝马斯和罗尔斯所论述的那样,是公众在“非强迫”前提下形成的“重叠共识”的具体体现。哈贝马斯认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主体间的相互交往可以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所具有的普遍性,是通过交流与沟通,通过人们之间的协商、商谈以及相互理解和相互宽容而达到的^[9]。罗尔斯也对公共理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10],公民通过充分地讨论所达成的“重叠共识”是依赖于公民理性的。民主价值正是建立在成熟的公民社会基础上,在实现各项民主目标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鲜明特征的价值。登哈特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在其公共服务理论中不断强调提出要重视公民的观点。

2.2.2 公共利益价值 公共利益价值是公众在公共空间追求公平正义等社会价值目标时体现的价值。相对于公共体育来说,公共利益就是公民权利、公民健康促进、公共空间稳定并保持一定的扩展等基本功能的实现;而其中,公民健康运动促进又成为公共利益价值在体育领域中价值诉求的核心。体育的公共价值属性来源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11]。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之一,体育,从其产生之初就以公共利益价值实现为其存在前提的。

2.2.3 组织价值 组织价值一方面表现在组织的设计和运行可以很好地为体育公共服务提供有力的支持,一方面则表现在组织与其他价值体系要素之间如何维持一个良好的平衡状态。组织价值总是通过组织设计与运行来实现的。组织设计包括多种组织价值,组织价值关系到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一般说来,组织设计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公民真正享有体育的基本权利,保证公共体育价值得以实现。

3 公共体育发展方式构建

3.1 公共体育发展方式构建的现实基础

3.1.1 国际对公共社会发展方式探索的借鉴 当前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无法摆脱全球化发展模式的影响。在国际社会上,人们对日益显现的公共问题的积极关注推动着国际社会的公共化转型。这种转型推动着各国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有意思的是,一方面要强化政府在公共领域中服务职能,突出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引导和干预,另一方面“政府规模的扩大和政府角色的膨胀”却成为新的社会关注热点问题导致了社会对政府的不满。于是,一场以“市场为基础、政府企业化”的政府改革肇始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逐步扩展到其他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这场改革运动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的运动实质就是将政府的部分公共服务职能,以外包的形式,委托给企业承担,以改变目前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所带来的种种困境。

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再从公共管理到公共治理^[12],国际社会对公共社会治理过程中范式的转换,直接引发了人们对其执行后果的争论。

在新公共管理看来,政府的基本角色是掌舵,而非是传统公共行政所扮演的划桨的角色。政府在公共领域中,只需对什么是公共事务、理应提供哪些公共物品和服务等基本问题进行梳理,进而将所需要向公众提供的服务以外包的形式,转由市场来提供,政府向市场购买并支付这些外包公共服务的基本成本。

然而,新公共管理存在着备受学者批判的问题。以在公共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和私人企业的管理方法为主要方式的新公共管理,在取得较为突出的政府治理效果之后,新公共管理开始逐渐显现种种的社会弊端,社会各界的质疑声此起彼伏,对新公共管理的保守主义倾向、经济学帝国主义性质、对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差别的忽视和新对政府责任的逃避、公共权力的外包所导致的新的社会寻租问题、以私营组织来承担公益性的公共服务所导致的公共成本上升及服务不均等问题日益严重。

在全面反思新公共管理的基础上,登哈特提出了新公共服务理论^[13]。这一理论针对公共事物管理和公民及其公共利益满足等价值实现所提出的解决方案,规定了政府在向社会提供正义、公正和公平的民主生活方面的责任,使人们看到了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公共利益保障的可能性,表现出某种替代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趋势。

在新公共服务看来,政府理应从监管者的角色中

解放出来,因为其核心职能是向公众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即服务,而非掌舵。可以说,新公共服务是建立在社会具有相等程度的成熟水平上的一种理论,它要求社会具备成熟的思考能力和较高的公共理性水平。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公民权利与公共利益能够获得充分的表达是新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缺乏公共理性或公共理性不足,就无法形成一种“重叠共识”,新公共服务构想就很难实现。

这些公共观点的形成,均依赖于公民理性水平。因此,如果社会缺乏公共理性或公共理性不足,不仅可能无法形成一种“重叠共识”,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可能形成错误的“重叠共识”和决策,从而误导社会的发展方向,导致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很显然,将政府从掌舵的位置上替换下来而只让其扮演服务员的角色,显然同样会令社会发展充满更多的不可预见的危险。由是观之,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14],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选择之一。

3.1.2 国情基础 我国社会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这与西方以私有制度为基础构建的市民社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客观地讲,由于受到多年来计划经济和国家包办的影响,我国逐渐形成了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发展结构。政府一支独大,公共空间长期以来被政府所占有,形成了一种失衡的社会结构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伦理严重缺失^[15],公民意识和公民体育权利意识较为淡薄,由此造成了社会公共理性的严重不足。因此,我国政府如何从一个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有效政府的转变^[16],从而保证我国政府能够向社会提供丰富的体育公共服务,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和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的公共转向还要面临另外一个严峻的现实,即由于多年来我国是以国家体育发展为主要方式的,体育基础建设也总是以满足为国争光的国家体育发展为前提规划和展开的,因此体育公共基础十分薄弱,公共服务体系非常不完备,存在较为严重的公共体育服务问题^[17]。在这样的背景下,解决构建完善的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体系的问题就显得越发艰巨。

然而,构建公共体育发展方式必须以较为成熟的市民社会为前提,以较为成熟的公共理性为基础,在公民自由表达而形成非受迫性共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大政府、大社会和公共理性不足严重制约着我国公共体育发展方式的建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影响我国公共体育发展方式构建的关键。

我们似乎可以确立这样的问题解决思路:(1)由

于我国政府主导着社会结构的发展,所以多年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组织理性。所谓组织理性是以组织为载体的理性,它是这样一种状态,即一个社会组织中拥有了那些得到主要组织成员自觉遵循的一套独特的共识性或强制性的行动逻辑规则和经验惯例,这些规则和惯例或者与组织生存和组织各种目标的实现手段相关,或者与组织成员在组织中的地位合法性有关^[18]。因此,在公共理性不足的阶段,作为公共组织的政府,可以通过较为成熟的组织理性暂时替代公民理性,从而形成重叠性共识。当然,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继续强化政府的组织理性,而恰恰是相反,用成熟的组织理性替代公民理性,可以有效地解决公民理性不足而导致的公共体育发展方式无法真正确立这一问题。

既然组织理性替代公民理性是作为一种过渡式安排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了确保公共体育发展方式的科学确立,同时也对可能膨胀的组织理性进行必要的制约和束缚,特别是对可能形成的新的公权寻租问题的制约,就必须建立一种高效的民意表达和反馈机制,一方面要有顺畅的民意表达路径,从而使民意表达可以直达各个公共决策环节,另一方面则要依据公共理性诉求要求,针对政府可能出现的“僭越”行为,建立公民的监督与信息反馈机制,对政府行为进行监控,确保公民意志得以正确表达和真正实现。

国家体育方式转向公共体育方式、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正如西方国家在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过程那样。有学者研究认为,西方国家公共服务的变化,大体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公共服务、国家干预主义时期的公共服务、新公共管理运动时期的公共服务和新公共服务这样一个发展轨迹。体现了从有限、被动,到近乎无限扩展的过度服务,又到适度、整合、顾客导向以及凸现公民权利、人文主义和民主价值的公共服务的发展特征。如果仅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规模与量上来看,似乎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又到小的往复循环^[19]。我国公共体育发展方式的建立,必然也要经历一个类似的过程才能够最终确立下来。

在我国,由于政府行为对体育发展方式的转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20],因此重新解释和定位政府的公共角色^[21],充分考虑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特别是鼓励以利他精神、志愿精神、人道精神、社群精神和公益精神为行动理念和价值追求的第三部门的积极参与,使之成为与政府一道共同实现良好治理的最佳伙伴^[22],才有可能建立与公共体育发展方式相适应的管理结构。

3.2 公共体育发展方式的基本结构 作为公共社会

发展的必然产物。构建公共体育发展方式首先必须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发展框架,使得公共体育发展得到有效地执行。

按照相应的基本理论的支持,我国公共体育发展方式应构建以下图所示的基本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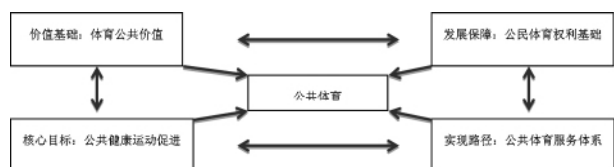


图 2 我国公共体育发展方式结构图

从构建的模式图来看,公共体育发展方式是由 4 部分构成的:

首先,公共体育必须建立稳固的公共价值基础。公共体育发展方式是以公共价值实现为其存在前提的,这是因为公共体育本身就内含着特有的公共价值。因此,我国必须推进以体育公共价值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构建工程,构建具有和谐公共伦理基础的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方式。然而,有学者研究认为^[23],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公共服务伦理失范现象,因此构建良好的公共价值体系的任务十分紧迫。

其次,通过修订相应的体育法律,清晰确立公民体育权利的基本内容和实现保障条件等内容,以使我国公共体育发展具有深厚的法律基础。这样,公民体育权利就可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以此为基础的公共体育的共识就可能迅速形成,从而使体育发展顺利进行。

再次,科学确立公共体育发展方式的战略目标,逐步形成以公共健康运动促进这一“非强迫性共识”或“重叠性共识”为战略目标的体育发展方式。要建立公共战略,因为公共战略是实现公共价值目标的有效保证^[24]。公民健康是公民高水平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公民对自身健康的价值诉求必然成为其有效解决基本生存问题之后首先要积极面对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基于健康运动促进的公民共识很容易形成,并成为影响公共体育发展方式关键因素。

最后,既然公共体育的存在是以满足公民共识——公共健康的运动促进为前提的,那么这必然要求这一方式要构建合理的、高效的实现路径,否则公共体育发展将会遭遇难以继的困境——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也就无法形成深刻影响公民形成“有利共识”的力量;一旦公民因为体育发展无法实现其价值目标而形成“共识”——一种消极的公民共识,那么公民理性的价值诉求将导致公共体育发展方式的瓦解。既然我国公共理性不足而组织理性成熟,那么在

近阶段以组织理性为主导、公民理性为辅助而建构公共体育目标实现路径,必然成为我国政府必须有效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25]。

由于我国客观存在的基于公共组织的制衡设计原则和公共服务的特殊性^[26]所形成的“反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因此消解这一悲剧就必须要在建立基础性公共体育服务的“产品目录”的基础上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27],向公民提供公共体育设施服务、公共体育教育服务、公共体育组织服务、公共体育指导服务、国民体质监测服务、公共体育制度服务、公共体育信息服务、奥运(全运)争光服务等^[28]。

4 结 语

我国体育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任务前提下发展起来的。从实现国家政治目标到新近提出的实现公共服务目标,我国体育正在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变革:从国家体育走向公共体育。在确立公共体育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公共体育价值基础及内涵、公共体育发展方式的模式构建等问题都成为亟待解决的系列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 [1] 马德浩,季浏. 新时期的三大改革对中国体育发展方式改革的影响[J]. 体育科学, 2011(5): 14-20.
- [2] 亚当·斯密. 国富论[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3] 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行动的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4.
- [4] 国家体育总局. 改革开放 30 年的中国体育[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8: 2.
- [5] 田雨普. 新中国 60 年体育发展战略重点的转移的回眸与思索[J]. 体育科学, 2010(1): 3-9.
- [6] 常乃军, 陈远军. 公民体育权利本原探析[J]. 体育学刊, 2008(6): 10-13.
- [7] 胡小明. 分享运动——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J]. 体育科学, 2010(11): 3-8.
- [8] 梁莹. 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价值”与“价值中立”——公共管理价值回归的历史叙事与继往开来[J]. 中国行政管理, 2012(5): 105-109.
- [9] 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行动的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4.
- [10] 罗尔斯. 何怀宏, 等译. 正义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11] 董传升. 公共需求与体育的演进[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0(2): 1-5.

(下转第 63 页)

- [4] 李世称, 邵雄杰, 刘军等. 运动对肥胖大鼠脂肪细胞脂联素 mRNA 表达的影响[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09, 26(2): 206-213.
- [5] Paul M. Coen, Zofia Radikova, Bret H, et al. Skeletal muscle mitochondria in insulin resistance: differences in intermyofibrillar versus subsarcolemmal subpopulations and relationship to metabolic flexibility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1, 96(2): 494-503.
- [6] Karbowski M. Mitochondria on guard: role of mitochondrial fusion and fission in the regulation of apoptosis [J]. *Adv Exp Med Biol* 2010, 68(7): 131-142.
- [7] Baloh RH, Schmidt RE, Pestronk A, et al. Altered axonal mitochondrial transport in the pathogenesis of Charcot-Marie-Tooth disease from mitofusin 2 mutations [J]. *Neurosci* 2007, 27(1): 422-430.
- [8] Nakamura T, Cieplak P, Cho DH, et al. S-nitrosylation of Drp1 links excessive mitochondrial fission to neuronal injury in neurodegeneration [J]. *Mitochondrion* 2010, 10(5): 573-578.
- [9] Romanello V, Guadagnin E, Gomes L, et al. Mitochondrial fission and remodeling contributes to muscle atrophy [J]. *EMBO J* 2010, 29(10): 1774-1785.
- [10] R. H. Houtkooper, F M. Vaz. Cardiolipin, the heart of mitochondrial metabolism [J]. *Cell. Mol. life Sci*, 2008, 65(16): 2493-2506.
- [11] Zhang CM, Chen XH, Wang B, et al. Over expression of NYGGF4 inhabits glucose transport in 3T3-L1 and ipocytes via attenuated phosphorylation of IRS-1 and Akt [J]. *Acta Pharm acol iol Sin* 2009, 30(1): 120-124.
- [12] 余章斌, 郭锡熔. 肥胖相关新基因 NYGGF4 的系列研究[J]. 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2012, 27(1): 53-56.
- [13] 夏黎, 钱玲梅, 孔祥清. NYGGF4 小鼠同源基因 mRNA 在遗传性 ob/ob 肥胖小鼠体内的表达[J]. 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2008, 23(19): 1488-1490.
- [14] Chen H, Vermulst M, Wang YE, et al. Mitochondrial fusion is required for mtDNA stability in skeletal muscle and tolerance of mtDNA mutations [J]. *Cell* 2010, 141(2): 280-289.
- [15] Chen H, Deamer SA, Ewald AJ, et al. Mitofusins Mfn1 and Mfn2 coordinately regulate mitochondrial fusion and are essential for embryonic development [J]. *Cell Biol*, 2003, 16(2): 189-200.
- [16] Zhao J, Lendahl U, Nister M. Regulation of mitochondrial dynamics: convergences and divergences between yeast and vertebrates [J]. *Cell. Mol. Life Sci* 2012, 18(2): 165-197.
- [17] Ishihara N, Nomura M, Jofuku A, et al. Mitochondrial fission factor Drp1 is essential for embryonic development and synapse formation in mice [J]. *Nat Cell Biol*, 2009, 10(11): 958-966.
- [18] JX Rong, Y Qiu, MK Hansen. Adipose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is suppressed in db/db and high-fat diet-fed mice and improved by rosiglitazone [J]. *Diabetes*, 2007, 56(17): 1751-1760.
- [19] H Ding, N Jiang, HJ Liu et al. Response of mitochondrial fusion and fission protein gene expression to exercise in rat skeletal muscle [J]. *Biochimica et Biophysica Acta*, 2010, 18(3): 20-256.

(上接第19页)

- [12] 顾建光. 论当代公共管理三大范式及其转换[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12(5): 7-15.
- [13] 珍妮特·V·登哈特, 罗伯特·B·登哈特. 新公共服务: 服务, 而不是掌舵[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7.
- [14] 张康之, 李传军. 公共管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J]. 行政论坛, 2010(5): 1-7.
- [15] 苗月新. 公共管理伦理缺失之成因及其对策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11(4): 60-64.
- [16] 白晋湘. 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体育职能转变的思考[J]. 体育科学, 2006(5): 7-11.
- [17] 肖林鹏. 论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基本问题[J]. 体育文化导刊, 2008(1): 10-13.
- [18] 赵孟营. 论组织理性[J]. 社会学, 2002(4): 77-87.
- [19] 汪来杰. 西方国家公共服务的变化: 轨迹与特征[J]. 社会主义研究, 2007(6): 89-92.
- [20] 丁亚兰. 体育发展方式转变中政府行为的分析[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2(3): 272-276.
- [21] 陈振明, 陈志清. 后危机时代政府的角色[J]. 中国行政管理, 2011(4): 125-129.
- [22] 罗伯特·T·戈伦比斯基, 杰里·G·史蒂文森. 非营利组织管理案例与应用[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30-311.
- [23] 王家合. 当代中国公共服务伦理: 价值、失范与重构[J]. 中国行政管理, 2011(9): 73-77.
- [24] 陈振明. 战略管理的实施与公共价值的创造——评穆尔的《创造公共价值: 政府中的战略管理》[J]. 东南学术, 2006(2): 27-34.
- [25] 董传升. 论我国公共体育发展道路选择的基本问题[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09(4): 6-9.
- [26] 严荣. 反公地悲剧与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创新[J]. 经济体制改革, 2007(5): 29-33.
- [27] 郇昌甸, 肖林, 杨晓晨.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研究框架探讨[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09(2): 4-10.
- [28] 郇昌甸, 张琮. 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概念的辨析[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1(3): 305-308.